

改革开放以来 国内新民学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冯 兵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新民学会研究,突出表现为重视新民学会会员与新民学会史实,将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与勤工俭学,新民学会与中共组织,新民学会的性质、作用等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体现出学术界对新民学会的研究趋向丰富、深入、细化的特点。新民学会会员研究沿袭以往聚焦学会早期领导者蔡和森、毛泽东等人的同时,亦将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纳入研究范围,并初步观照女性会员的成长历程。学界就新民学会发起、成立、活动及发展的史实达成共识的同时,仍存拓展研讨的空间。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新民学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传播方面着墨甚多,但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南后,以何种渠道和形式于基层社会迅速扩散,以及在国内外何以产生广泛影响,仍有探讨的必要。对新民学会与勤工俭学运动的研究,充分强调新民学会及骨干会员对留法勤工俭学的作用,但对毛泽东及女性会员与留法勤工俭学关联的关注仍显薄弱。新民学会与中共组织的复杂关系,以及新民学会性质、作用的研究引起学界重视和细化研究。新民学会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有赖于采用更宽广的研究视域,如走出新民学会观察新民学会、从新民学会看当时社会,以及有关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新的主题与领域的挖掘、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突破。

关键词 新民学会 马克思主义传播 勤工俭学 中共组织

冯 兵,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610065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党史研究和社会组织研究的深化,关于新民学会的研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研究者从新民学会会员,新民学会具体史实,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与勤工俭学,新民学会与中共组织,新民学会性质、作用与启示等方面开展了多视角研究,使新民学会逐渐成为学术热点。对国内与此有关的学术进展做简要介绍和综述,有利于推动新民学会研究的深入。

一、新民学会会员研究

对新民学会会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民学会早期的领导者蔡和森、毛泽东等人。新民学会早期

本文为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重大项目(2018HHS-34)、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青年科研团队项目(2018SKZX-PT151)阶段性成果。

领导者蔡和森的思想变化,以往研究强调其由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化^[1]。但谢炳怀则认为新民学会成立前后,蔡和森未形成激进民主主义思想^[2]。另有学者认为蔡和森思想经历了从最初注重人才的储养练习,提倡实践活动中的枉尺直寻,到留法勤工俭学后深入了解西方政治形态,努力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提出仿效俄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转变^[3]。

关于蔡和森与新民学会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蔡和森在新民学会组建和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功不可没,表现为传播勤工俭学思想,谋求赴法勤工俭学机遇;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完善新民学会思想;带动湖南青年赴北京参加示威请愿,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组织蒙达尼会议,引导勤工俭学励志会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提出中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党,并系统阐述了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组织原则^[4]。有学者认为蔡和森比较完整而系统地向学会输送马列主义理论,提出了光辉的建党学说,明确了学会的发展方向^[5]。

关于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互动关系,有研究者指出,新民学会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成长的平台。毛泽东为新民学会呼号奔走,扩大了学会在湖南的影响;而新民学会亦为毛泽东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其得以两次进京,深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思想发生飞跃,通过领导新民学会实际斗争,个人能力大大提升^[6]。青年毛泽东在领导学会组织工农群众和广大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培育了新民学会精神,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7]。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新民学会经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革命锻炼,会员增长了几倍,而且已不是一个纯学术的团体^[8]。正是在探索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方法的过程中,毛泽东及新民学会的战友们逐步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分析与处理一切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9]。

将新民学会会员作为群体加以探讨,不失为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文世芳强调,新民学会会员群体是由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学术性群体、具有革命倾向的政治性群体、向党组织过渡的革命性群体。研究新民学会时应当关注新民学会会员群体成员之间的角色分工、角色层级、角色沟通,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有形规范和无形规范,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年龄构成、地域构成、性别构成、教育背景、家庭背景。上述因素无疑构成了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基本元素^[10]。

学者们对新民学会会员的组成、迥异的人生轨迹、成长目标等问题均有热烈的讨论。边远对毛泽东等74位新民学会会员的姓名、籍贯、求学经历、工作性质等进行了梳理^[11]。缺憾之处在于部分会员资料不全,遗漏之处颇多。这些会员由于生活在动荡年代,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人生信仰有很大不同,因此也导致了其不同的人生结局。以毛泽东为代表,多数会员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张国基为代表,不少会员在科教文化领域成就斐然。以萧子升为代表,极个别会员走上无政府主义道

[1]周玲:《蔡和森与新民学会研究》,[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谢炳怀:《新民学会成立前后蔡和森思想浅析》,[长沙]《湘潮》2015年第3期。

[3]韩诚:《从“储养练习”“枉尺直寻”到研究社会主义——〈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与蔡和森早期思想》,[长沙]《湘潮》2016年第3期。

[4]郝鑫:《蔡和森与新民学会研究》,[哈尔滨]《边疆经济与文化》2016年第5期。

[5]刘轶强:《蔡和森与新民学会》,[太原]《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

[6]文茂琼:《机遇和平台——新民学会与毛泽东》,[长沙]《船山学刊》2014年第2期。

[7]高菊村、胡蓉:《青年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精神》,[成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6期。

[8]李锐:《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上海]《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

[9]张馨:《救国真理的虔诚求索者——毛泽东和他的新民学会战友》,[西安]《理论导刊》1993年第10期。

[10]文世芳:《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研究》,[湘潭]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1]边远:《新民学会会员介绍》,[长沙]《湖南党史月刊》1988年第4期。

路。虽然新民学会会员由于信仰差别走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但从总体上讲,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会员满怀爱国热情,矢志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投身社会变革,推进人类进步^[1]。

新民学会会员走上成才之路,自然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各自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但他们在年轻时代就注意培养成才意识,正确选择和不断追求成才目标则是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2]。他们青年时代即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客观而论,这一时期大多数青年还处于懵懂和迷茫状态,即使是毛泽东、蔡和森,思想也都还不够成熟,不够系统和全面,还处在思想认知发展的萌芽状态^[3]。但新民学会会员的思想是饱满的、丰富的,他们除上述思想和意识之外,对女性问题、婚姻家庭问题亦有不少有见地的主张。需要强调的是,新民学会女性会员为数不少。据有关学者考证,女性会员为19人。这些女性会员是五四时期湖南新女性的杰出代表,她们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前挺身而出,为推动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4]。

女性会员既有参与革命的热情,又有独立的思想。对待事业与爱情、社会与家庭均有独到见解。她们与男性会员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成为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也是留法学生政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锻炼和培养了她们的才干^[5]。如任培道,主张设立女子师范大学,反对师专男女兼收,并为之在国民党立法院中奔走呼吁^[6]。女性会员对家庭和爱情亦有深刻认识。强调妇女解放,恢复独立人格;主张恋爱自由,婚姻以恋爱为重;主张婚姻自主,反对家庭包办。会员的女子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主张,对开化思想,启发人们为自由、平等、幸福而与封建礼教展开斗争起了很大作用^[7]。

二、新民学会史实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有关新民学会的基本史实,已有研究基本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但仍有进一步拓展和讨论的空间。例如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该报告由毛泽东负责撰写、编辑出版,记载着学会的发起、成立、活动及发展的全部历史。其价值自不待言,但版本亦有不同^[8]。关于新民学会成立的具体时间和参加人员,学界看法存异。韩凌轩认为,新民学会成立的时间应为1918年4月14日。关于成立大会的出席人员,大致有三种说法,分别为十二人说、十三人说、十四人说。杨晓伟把毛泽东追忆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萧三日记和陈书农的回忆作为三个主要的佐证性事实,得出十四人的结论^[9]。韩凌轩强调萧三日记中所载十三人说较为可信^[10]。刘永生对新民学会成立时间的认定与韩凌轩相同,强调4月14日应为新民学会成立的日子。其撰文指出新民学会会员总人数应当不低于74名。实际的会员数可能会更多^[11]。

学者亦对学会宗旨、规约、文化基础等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范忠程指出,新民学会的宗旨是革

[1] 赵丛玉:《追踪新民学会会员迥异的人生轨迹》,〔长沙〕《湘潮》,2008年第5期。

[2] 刘建平:《论新民学会会员成才目标的选择》,〔长沙〕《湖南党史月刊》1988年第4期。

[3] 于清震:《浅论新民学会会员的思想认知及主要文化实践》,〔南京〕《文教资料》2010年7月。

[4] 张杰、刘华清:《论新民学会女性会员与湖南五四运动》,〔长沙〕《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5] 张杰:《试论新民学会女性群体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长沙〕《湘潮》,2016年第4期。

[6] 曹亚黎:《新民学会的一个叛逆女性:任培道》,〔长沙〕《湖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7] 张利民:《试论新民学会会员的婚姻家庭观》,〔成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8] 宋斐夫:《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的版本问题》,〔长沙〕《求索》1988年第5期。

[9] 杨晓伟:《新民学会成立会议参会人员及人数考证》,〔长沙〕《船山学刊》2012年第2期。

[10] 韩凌轩:《关于新民学会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出席人员》,〔曲阜〕《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

[11] 刘永生:《关于新民学会若干史事的探讨》,《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期。

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规约是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宗旨和规约集中反映了新民学会会员真心求学，诚意做人的热切愿望，展示了他们勇对现实、奋发进取、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壮志豪情^[1]。范忠程强调新民学会成立的思想文化基础至少三个方面：一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二是近代民主启蒙思潮，三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民本主义的校园文化^[2]。这些文化、精神和思潮造就了新民学会的文化底蕴，亦对学会发展的未来目标产生了深远影响。

研究者认为新民学会的民族复兴思想包含着丰富内涵：复兴湖南是新民学会会员们孜孜以求的近期目标，复兴中国乃至世界是会员们追求的更高层次目标^[3]。新民学会的目标既涉及湖南，又凸显民族和国家利益，这与其成立时的文化基础有密切关系。正基于此，新民学会后来的发展有一个转变过程，既有一如既往坚持初衷者，亦有观点相左而分道扬镳者。黎永泰的研究即强调了这一转变过程，认为新民学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后期转变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科学社会主义团体。它的转变过程正是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实践中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4]。胡长明则撰文指出新民学会的分化问题：多数会员是坚持进步和革命的“左”派，也有背离学会宗旨和革命运动的“右”派，还有无一定主张的中间分子^[5]。杜秀则从另一侧面强调了新民学会的典范地位，认为新民学会积极投身一系列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如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积极响应五四运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参加湖南自治运动，创办“文化书社”与“俄罗斯研究会”，等等，成为全国青年社团的楷模^[6]。

新民学会在马克思主义于湖南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研讨的空间仍有不少。以往研究多集中论述新民学会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传播以及建党方面的贡献，至于新民学会将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南后，又通过什么渠道和形式将马克思主义于湖南各地迅速传播开来，则缺少深入研究。这与新民学会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不相称的。刘金如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民学会会员通过积极创办刊物、开办文化书社、创办新式学堂以及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等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开去，使湖南成为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有成效、最富有朝气的省份。新民学会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五点值得赞赏，分别为：创办进步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成立进步社团，凝聚革命力量，扩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队伍；成立文化书社，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阵地；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力量；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论战，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扫清障碍^[7]。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信、真懂。杨晓伟认为，新民学会会员多数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德理想与政治理想，经历了一个从理想主义云端落实到现实主义地面，进而基于湖南和中国实际，从道德试验到政治行动转换的历史进程。由此所生发的新民学会“踏着人生社会实际说话”的理想主义的创造、奋斗精神和实践探索品格，对直面当下中国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困境亦有启发^[8]。黄丽喜认为，新民学会在认识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湖南

[1]范忠程：《新民学会的宗旨、规约研究》，〔开封〕《史学月刊》，2011年第7期。

[2]范忠程：《论新民学会成立的思想文化基础》，〔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4期。

[3]喻春梅：《新民学会的民族复兴思想》，〔长沙〕《文史博览(理论)》2016年11月。

[4]黎永泰：《试论新民学会由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西宁〕《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5]胡长明：《试论新民学会的分化》，〔成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8年第4期。

[6]杜秀：《五四时期青年社团的楷模——新民学会》，〔济南〕《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7]刘金如：《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

[8]杨晓伟：《新民学会会员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印迹及其精神的当代价值》，〔成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第2期。

党组织三个方面做出了贡献^[1]。刘仲良强调新民学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and 影响,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五四运动爆发到驱张斗争开始。第二阶段以驱张斗争为起点,以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为终点。1920年底至1921年初,新民学会终于实现了一个飞跃,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阶段^[2]。

三、新民学会与勤工俭学研究

关于新民学会与勤工俭学运动,学者们一致认为,新民学会积极倡导和组织了以湖南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给他们提供了求学和做工的机会,整个湖南地区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新民学会的推动下得到迅猛发展。新民学会的作用和地位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组织推动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是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宣传各种思潮以解放思想;三是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还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成立社团,宣传各种社会思潮,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3]。

唐斌等学者强调指出,新民学会是赴法勤工俭学的领导中坚。毛泽东、蔡和森团结的一批有血性、有志气、有抱负、有担当的爱国青年,多数参与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各项工作。新民学会积极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做工求学,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事实际的斗争。至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者已有1600多人,其中以四川、湖南人为多(参与的湖南人有346位)。赴法勤工俭学的最大成果是提出“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以及“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新民学会与赴法勤工俭学的直接成果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习近平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是在法国负笈求学的,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等人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4]参加旅法勤工俭学的湖南人中间,产生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者,他们是国家栋梁、人民英雄,风范长存、英名永驻!由此可见,新民学会在国家 and 民族发展中具有卓越贡献和崇高地位。

这一观点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亦可获得充分的论据。唐斌认为,旅法会员通过勤工俭学生涯的艰苦磨练和斗争实践,大都抛弃了工读主义等幻想,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救国道路,为日后肩负起中国革命之重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人才资源^[5]。窦爱芝撰文指出,毛泽东、蔡和森等利用在京机会,广泛接触和研究各种新思想,研读介绍新学说的报刊书籍,得到了许多新的知识。他们还组织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向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李大钊、陈独秀请教学习,与在京的名流学者讨论各种学艺问题,还与各方面的进步青年建立了广泛联系。这就扩大了新民学会的活动范围,加强了湖南与全国各地的思想文化交流,大大推动了湖南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那些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也把在法国学得的先进思想传入国内,并利用法国的条件更好地了解和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及世界革命运动^[6]。欧阳楚龙、刘建平认为,新民学会与留法勤工俭学,在全国革命活动和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值得肯定^[7]。鲜于浩指出,新民学会与留法勤工俭学会员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新民学

[1]黄丽喜:《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长沙〕《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2]刘仲良:《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益阳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3]于佳亮:《论新民学会与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4]《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3月28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3/28/c_119982956.htm。

[5]唐斌:《浅述新民学会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长沙〕《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6]窦爱芝:《新民学会组织湖南青年参加旅法勤工俭学的情况》,〔天津〕《历史教学》1980年第11期。

[7]欧阳楚龙、刘建平:《新民学会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长沙〕《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第4期。

会留法会员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独树一帜,对运动的发展趋向有极大的影响;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于新民学会会员的政治信仰以及学会分化所起的作用亦极为重要^[1]。

学者们在研究留法勤工俭学与新民学会的关系时,对新民学会的贡献赞赏有加,观点趋向一致。但对毛泽东与勤工俭学问题、女性会员与勤工俭学问题的关注比较少。难得的是,李永春关注到了新民学会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在留法勤工俭学问题上的艰难抉择。其撰文指出,毛泽东未能出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是他担负新民学会的实际领导责任,学会的社会活动、学会基础事业的确立和会务的发展制约了他为期两三年的出国准备计划的实施。在求学与做事的两难选择中,他牺牲了个人的出国求学^[2]。张杰则关注到新民学会女性群体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问题。新民学会84名会员中有19名女性。她们是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也是留法学生政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锻炼和培养了她们的才干,促使她们迅速成长^[3]。

四、新民学会与中共组织研究

新民学会与中国共产党组织之间存在紧密而复杂的关系。五四运动期间,新民学会一批先进分子不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民学会会员组织、领导、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新民学会先进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必须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要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条件、步骤,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4]。唐诗认为新民学会为湖南共产党的早期党建工作做了准备。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和领袖,以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何叔衡、罗学赞、蔡畅、邓中夏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新民学会会员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5]。另有研究者认为,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干部队伍准备上的贡献居于首席地位^[6]。陈家骥指出,新民学会直接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摇篮之一^[7]。

关于新民学会与湖南党组织建立的关系,不少学者研究的内容更为具体。有学者认为新民学会促进了湖南早期党的干部的成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8]。新民学会是团结一代湖南精英的旗帜,是一所储备智能的学校,是积累革命经验的源泉^[9]。新民学会在中共建党前的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0]。新民学会为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新民学会通过办报刊、创文化书社等途径传播新思想,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社会运动实践的

[1]鲜于浩:《新民学会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长沙〕《求索》1993年第5期。

[2]李永春:《求学与做事:毛泽东勤工俭学准备中的两难选择——以新民学会为中心的考察》,〔长沙〕《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3]张杰:《试论新民学会女性群体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长沙〕《湘潮》,2016年第4期。

[4]戴安林:《新民学会先进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5]唐诗:《新民学会与湖南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建立》,〔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6]王启才:《蔡和森、新民学会与长沙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长沙〕《湘潮》(纪念蔡和森诞辰120周年专刊)2015年第3期。

[7]陈家骥:《新民学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8]张万禄:《毛泽东的道路:1921—193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9]雷国珍:《论新民学会与湖南早期干部的成长》,〔长沙〕《湖湘论坛》1992年第1期。

[10]周树辉:《毛泽东与新民学会及湖南地区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成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3期。

舞台、主要骨干锻炼的平台,是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起点和培养共产党员的摇篮^[1]。刘华清认为,新民学会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领袖基础和实践基础,是这一群体萌芽的重要标志^[2]。新民学会还与中国北方的共产主义小组及东方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遥相呼应,密切配合,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3]。

五、新民学会的性质与作用研究

关于新民学会的性质,多数研究者认为,新民学会诞生和活动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因此,其性质亦有转变时期的特点。大致观点如下:其一,前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后期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团体;其二,由一个追求个人及全人类向上而汇集起来的进步团体,逐步发展成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的革命团体;其三,开始是一般的学术团体,中期是革命团体,后来逐渐发展为带有浓厚共产主义思想色彩的革命团体;其四,前期是互助向上的进步团体,中期是革命团体,后期是湖南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萌芽;其五,由革新学术、改良人心的进步社团逐步发展成为改造社会制度而奋斗的革命团体。

关于新民学会的发展阶段,学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意见主张以1920年7月留法新民学会会员蒙达尼会议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学术团体,后期则是一个革命团体。另一种意见主张应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学会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互助”“向上”的进步团体。后段是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革命团体。有人认为前段是一个主张教育救国的团体,后段是主张政治救国的团体。第三种意见主张把新民学会三年多的历史分三个阶段。第一、二阶段是一个受杨昌济、蔡元培思想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步团体,第三阶段成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革命团体^[4]。

新民学会还对湖南现代化具有促进作用。其一,革新湖南教育;其二,争取妇女解放;其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其四,造就了湖南一代共产主义者^[5]。此外,新民学会对当代青年的成长具有启示作用。新民学会给当代青年留下的精神财富是:锐意革新,勿蹈常故,探索真理,主义求真,注重实践,克己修身。它启示当代青年要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增强报效国家民族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增强改革开放意识,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发扬艰苦奋斗、勇于探索的精神;养成少说空话、多做实事的良好作风^[6]。上述观点主要倾向于新民学会宏观的作用和影响,陈家骥则撰文指出新民学会具体的历史作用。首先,新民学会组织了勤工俭学。其次,新民学会领导湖南群众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并领导了驱张运动。另外,新民学会还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革命组织的建立工作和联系工人的工作。可以说新民学会是湖南民主革命的先锋,是湖南共产主义运动的摇篮^[7]。王显成强调,新民学会促进了民主、科学思潮的传播,培养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学生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并促进了知识阶层与劳动群众的有机结合^[8]。

[1]李惠康、田华:《时务学堂、新民学会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产生》,〔长沙〕《船山学刊》2009年第4期。

[2]刘华清:《新民学会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形成》,〔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

[3]陈家骥:《新民学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4]莫志斌:《新民学会研究综述》,〔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5期。

[5]胡旭华:《新民学会与湖南现代化》,〔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6]陈特水:《新民学会对当代青年的启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

[7]陈家骥:《新民学会的创立及其历史作用》,〔合肥〕《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8]王显成:《浅说新民学会的特点与作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六、对新民学会研究的思考

史料整理和出版有待加强。著名学者季羨林曾经说过：“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离不开文献资料，不需要科学实验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更是如此。”^[1]这说明，科学研究尤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只有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在所有的文献资料中，档案作为“没有掺过水的史料”，理应受到党史研究者的重视。郑天挺认为：“历史档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视，应该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2]显然，新史料的挖掘是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向更加客观的重要条件。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中之所以存在一些不尽客观的结论，除了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缺陷外，史料挖掘不充分应该说也是原因之一。纵观关于新民学会的已有研究，资料单一的情况颇为普遍，所用资料多为《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等，偶尔涉及《湘江评论》《大公报（湖南）》《新民晚报》，资料来源和运用的多样性、丰富度均有待提高。

基于此，关于新民学会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是进行这项研究的关键。中国群团史、社会组织史的史料浩如烟海、数不胜数，散见于民国政府的法规法令、政府报告等之中，传于民间的报纸、杂志、文集、回忆录以及地方志，各地档案馆有关新民学会的档案资料亦属丰富，如湖南省档案馆、长沙市档案馆均存有有关档案资料。但从目前的状况观察，现辑成书的关于新民学会的史料严重不足，有关新民学会史料的整理有待强化。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学会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在关注国内史料搜集整理的同时，理应重视国外出版的各种文献资料、私人记录等，以便于对新民学会史料进行对比研究，挖掘其更深刻的参考价值。

新民学会研究要拓展主题，发掘新的领域。问题的选择不受固有观念或框架的束缚，而应根据历史演进的脉络，不断推陈出新，从不同侧面揭示新民学会在近代的多重角色。关于新民学会的兴起和发展方面，有些已提出的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加强与深化，如关于新民学会会员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而对其他会员的研究不多。国外研究新民学会的论著主要是美国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提到在长沙求学、征友、成立新民学会学生团体。然而，这是一段记叙性的文字，斯诺并未进行任何深入的研究。国外学者在一些研究毛泽东的著作中，谈到过有关毛泽东青年时代参加新民学会的经历，但尚未有对新民学会及其成员的专题研究。今后的研究，应关注新民学会其他会员，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探索新民学会会员的多种面相。

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研究有待强化，可将其群体特点、群体构成、群体发展等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凸显这一群体的本来面目和未来转变，并将之置于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变迁、互动的宏观历史场景之中，摆脱就新民学会本身开展研究的狭隘观念和眼光。在史实研究方面，可加强对新民学会的成立时间、参与人员、后期总人数、开会内容、成员信函往来等问题的考证研究。已有的关于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过多单纯强调新民学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作用，而关于新民学会采取什么途径和措施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步骤和阶段性成果，学会会员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等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研讨的余地。关于新民学会与勤工俭学的研究，主要围绕蔡和森进行探讨，缺乏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其他新民学会会员的研究。

关于新民学会与中共组织的研究，大多强调新民学会有利于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从理论传播、人员构成等方面着手，但对新民学会会员后来对早期全国党组织建立的贡献重视不够，特别是对中国

[1]季羨林：《漫议“糖史”》，[北京]《环球》1997年第6期。

[2]郑天挺：《清史研究和档案》，[北京]《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共产党领导的其他组织,如共青团等组织与新民学会的关系问题,存在忽视或轻视的情况。关于新民学会作用与启示的研究,主要从对党的思想建设、湖南现代化、妇女解放运动等几个方面展开,研究水平和视角停留于最为直观的感性认知。实际上,新民学会作为当时全国众多青年社团中的一个,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实现由研究生活、学术问题的社团,向政治性社团转变,由懵懵懂懂提出现实生活、工作目标的社团,向以国家、民族复兴道路为己任和目标的社会团体转变。这对今天社团管理与建设、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团体与国家互动关系的确立等问题,皆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例,新民学会会员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对今天年轻大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具有启发意义。以社团与国家关系为例,至少有两大关键问题需要深化探讨。首先,如何认识民国时期社会团体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来说,社团建设中政府的干预必不可少,社会团体与国家合作的一面很突出,而非只有对抗。因此,系统考察并客观评析二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对深入理解中国近代变迁的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如何建构政府与民间社会团体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这是未来新民学会研究需要考虑的一个思路 and 方向。

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突破。一是需要解决理论阐释与实际论述相脱节的问题。近些年对新民学会的探讨多数为平铺直叙的历史叙述,鲜有深度的理论阐释和解读。即使偶有重视理论阐释的研究成果,对如何将所用理论贯穿到对具体问题的实际论述之中的重视程度亦显不足,结果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实际论述基本上没有新意,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二是认真总结近年来新民学会研究中理论运用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对不同问题研究中所运用的理论及其相关成果逐一进行考察和分析,也可以加以相互比较,了解各自的优劣利弊,使其互相融合补充。如引用和借鉴西方理论阐释新民学会问题,需要关注西方理论在近代中国本土情境中的适应性,使之与本土史料的解读和史实的论证真正融为一体,避免削足适履的现象^[1]。大多数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一般性地就新民学会的某些具体问题开展研究,给人单一和沉闷之感。即使史学研究中最为常见的比较研究方法亦比较少见。新民学会与其他学会的比较、会员之间的比较、湖南新民学会与法国新民学会比较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只有对国内各地区之间、国内与国外、学会内部之间、学会内外等方面进行深度对比,才能更为准确地认识新民学会的特点。

分层次研究方法的应用严重不足。所谓研究层次,主要是指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不同的层次。宏观研究是从整体上对新民学会的综合论述,中观研究是对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等问题的考察,微观研究则是对某个新民学会会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就一般情况而言,比较充分的微观研究是中观研究的基础,中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如果微观研究和中观研究都不充分,宏观研究势必缺乏应有的基础与条件,所得出的结论也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欠缺^[2]。从新民学会研究的既有成果看,从整体上对新民学会进行综合论述的宏观研究较多,而将新民学会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的微观研究,以及将新民学会会员作为个案开展的微观研究为数不多,新民学会领导者之外,普通学会会员的研究难得一见。由此,应充分意识到微观研究的重要性,并勇于下苦功去搜集有关的档案、报刊、方志等各种资料,沉下心来进行扎实的研讨。

[责任编辑:道成]

[1]朱英:《中国商会史研究如何取得新突破》,〔杭州〕《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

[2]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